

代 替 恐 惧

[英] 比 万 著

李 大 光 译

内 部 读 物

商 务 印 书 馆

代 替 恐 惧

[英] 比 万 著

李 大 光 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应注明出处~~
并在海明外时，用原案。~~查~~

商 务 印 书 馆

1963年·北京

Aneurin Bevan.
IN PLACE OF FEAR
William Heinemann Ltd.
London, 1952

內 部 讀 物

代 替 恐 懼

[英]比万著 李大光譯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复兴门外翠微路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7号)

京 华 印 书 局 印 装

统一书号：3017·76

1963年5月初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63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138千字
印张 6 ² /16	印数 1—2,060册
定价(10)1.00元	

出版說明

本书是英国工党“左翼”領袖安奈林·比万(Aneurin Bevan, 1897—1960)在1952年写的一本宣傳“民主社会主义”的小册子。

比万出身于英国威尔斯一个煤矿工人家庭,十三岁时,自己也当了矿工,他积极参加工会活动,1916年还不滿二十岁,就被工人群众推选担任威尔斯工会煤矿工会分会主席职务。1929年起当选为下院議員,开始了他一生的政治生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工党在英国执政,比万在工党内閣内先后担任卫生大臣和劳工与国民兵役大臣。1951年保守党再度当政,工党退为在野党,比万仍然是工党的重要首領。1956年,比万被选入工党执行委员会,担任司庫职务。1954年,比万曾随英国前首相工党党魁艾德礼来中国訪問。

比万在工党领导集团中居于“反对派”地位,在工党党内具有相当影响。这是因为比万有某些主張确乎反映了工党下层群众的願望和要求。正因为如此,比万有几次与工党右翼集团发生公开分歧:1939年,因主張和英国共产党建立統一战綫,一度被开除党籍;1951年,因反对工党右翼的扩軍备战的龐大預算而辞去內閣职务;1954年,又因反对工党右翼的重新武装西德的政策而退出工党的领导集团;1955年与右翼集团在氫彈問題上意見不合,也曾一度被开除出工党議會党团。1956年,比万参加工党执行委员会以后,逐漸与右翼妥协,在若干原来与右翼有分歧的政策問題上,放棄了自己的主張。其实,即使在与右翼集团发生分歧时,比万也不是真正的左派,他始終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在許多根本原

則上他一直站在右翼社会党人的立場上。

比万的始終一貫的“民主社会主义”立場，从这本书中也可以看得很明显。

比万认为当代有三种社会观念：竞争的社会、整体的社会和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参看本书第 45 頁。）所謂竞争的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他生活在其中的英国社会。比万对竞争的社会是反对的，有些批判竞争社会的言論还相当激烈，儼然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样子。所謂整体的社会，他是指的社会主义社会，比万反对整体的社会，要比反对竞争的社会坚决得多。如果說他对竞争社会是持批判的态度，对整体社会則是采取辱罵的态度。在这本书里，比万污蔑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論是不少的，归結起来，不外是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下沒有民主，是法西斯的恐怖統治。比万还为社会主义制度下沒有民主，找到“病源”，他說：“我觉得馬克思主义的經典著作对于具有充分发达的选举的政治民主制度的作用問題，一貫是輕描淡写的。”“在他們的哲学里，他們是从不对这个問題像对其他問題那样加以發揮的。”（本书第 21 頁。）比万是一个浸透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不可救药的“社会主义”者，在他看来，即使消灭了私有制，如果沒有了資產階級民主制，也是枉然。这是他們“民主社会主义”者所決不可取的。所以他說只能从这两种情况下作出抉擇：“或是貧困利用民主制度取得对財產权斗争的胜利，或是財產权害怕貧困而摧毁民主制度。”（本书第 5 頁。）前者就是比万所鼓吹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后者就是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因此出路只有前者一条可走。比万所鼓吹的“民主社会主义”明明是一条中間道路，但是，他也知道，中間道路在今天已經騙不了多少人，因此他硬要让人相信“民主社会主义不是介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間的一条中間道路”，（本书第 100 頁。）表示它不是“依靠借

来的生命力生存下去”的。比万把“民主社会主义”之不能实现，归咎于英国人沒有把“苏联的共产主义和我們所說的社会主义……彻底分清”，他說：“如果苏联的行为不曾显露一副过于可怕的面貌，西欧也許真的会在战后走上社会主义。”（本书第 71 頁。）比万在本书中一再声言：“适合現代工业社会需要的唯一政治制度是民主制度。”（本书第 142 頁。）并在本书的結尾表示：“我深信只有民主社会主义的种种原则才可以广泛应用于人类現在所处的环境。在回顾三十五年多的工业上和政治上的活动之后，我沒有发现有什么理由要改变我的信念。”（本书第 174 頁。）可見，比万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立場是始終一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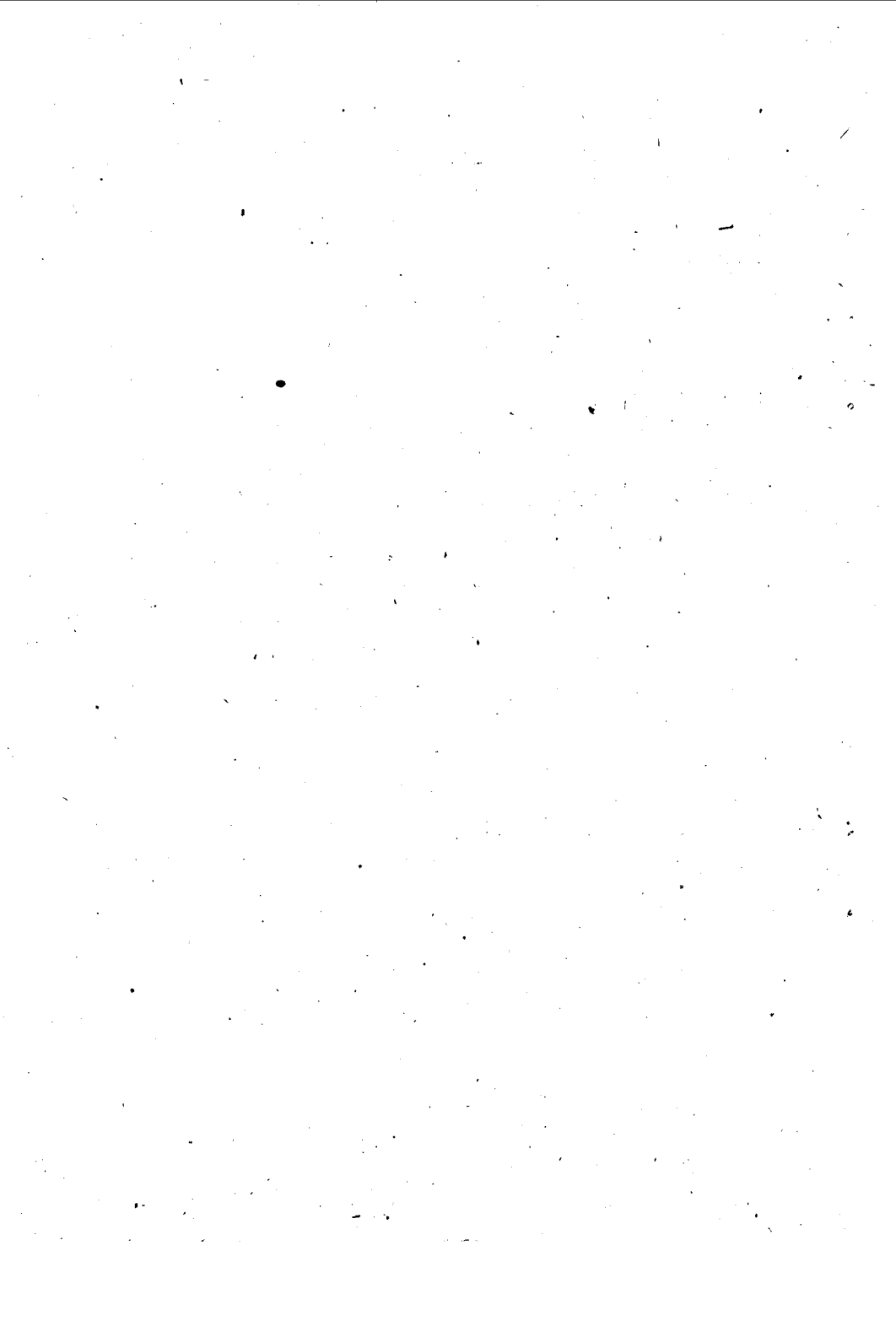
比万为什么要把他这本宣揚“民主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冠上“代替恐惧”这样一个題目呢？他在书內并未交代。尽管他提到有“失业的恐惧”、“战争的恐惧”等等，但从通篇看来，他的恐惧正是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对社会主义国家在英国工人群众中广泛而深厚的影响的恐惧。比万作賊心虛地說：“我必須說明一件事。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們並沒有为共产主义伤脑筋。我們所做的事情不是为了抗拒对克里姆林宮的恐惧才作的。我們几乎一点也不考虑这个問題。”（本书第 129 頁。）比万愈是这样說，愈表明这不过是“此地无銀三百兩”。比万要以“民主社会主义”来代替的正是这个恐惧。

商务印书館編輯部

1962 年 11 月

目 录

第一章	貧困、财产和民主制度	3
第二章	議會的作用——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14
第三章	近代人与近代社会	36
第四章	私人开支还是集体开支	55
第五章	免費的保健事业	76
第六章	疑虑的侵扰	97
第七章	社会的紧张	110
第八章	世界的领导地位	124
第九章	原料，物资缺乏与优先供应	152
第十章	民主的社会主义	170
附 注		175



第一章 貧困、財產和民主制度

这样一本书，如果由一个毋需天天被一些政治事务所糾纏的人来写，那从許多方面来看，都会合宜一些。然而，在我着手写的时候，我又感到像我这样一个从事政治实践的人却具备了那些过着比較超然悠閑生活的人所不具备的一些有利条件。因为自1914—18年大战结束后开始的这段政治时期的几根主要綫索，已經被編織在我本身活动的图案中了。

我开始政治生活的时候，并没有明确形成个人的志向，我不知道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也不清楚我要向什么方向发展。这些无聊的話，让善于編写离奇傳記的作家們去写吧。作为南威尔斯一家煤矿的青年矿工，我所关心的是一个现实問題：在大不列顛这个具体的国家里，权力在哪里，以及工人們怎样才能得到它？毫无疑问，这也是政治理論家們所喜欢談論的問題。但是，对于像我这样的青年工人們來說，这个問題的形成的方式却有天淵之別。在我們看来，它不是抽象的問題。我們的生活环境使它成为一个熾热发光的問号。权力在哪里以及通过什么途徑才能得到它？

可以立即看出：这个問題在我們思想上所表現的形式，和一个正在开拓的新社会里或者一位受过长期正規教育的人的心目中所表現的形式，是有所不同的。在那些情况下，問題是以这样的形式出現的，如：“我怎样才能成功？”或者，“我选择什么职业？”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們就不一定那么为自己打算，这只是由于我們的生活性质使問題以階級的形式而不以个人的形式表現出来罢了。那时在我們的周圍已經全是产业革命的既成事实。我們在矿井、

鋼廠、鑄造廠、紡織廠、製造廠和其他工廠里工作着。這些都是權力和財富的顯而易見的工具。因此對於我們說來，問題就不以這種方式表現出來，如：“我怎樣才能買下一個鋼廠，或者買下它的一部分？”這種可能性太遙遠了，沒有什麼現實意義。

同時，我們具有可以追溯到憲章運動的悠久的階級行動傳統；因此，在我們看來，權力就意味着運用集體的行動來改變社會，從而使我們全體一同得到提高。放任主義對我們起不了鼓舞的作用。因為個人解放的希望已經在確立了的權力的壓迫下破滅了。我們是工業文明的產物，我們的心理也與這個事實相吻合。個人的雄心為社會的強制力所抑制。因此，個人的主動精神沿着環境已經為我們開辟的集體途徑發展；正如許多小河沿着現成的水道流去一樣。出現在我們面前的社會是一些相互衝突的社會力量的決鬥場，而不是個人奮鬥的一個縱橫交錯的活動網。

這些力量主要有三：財產私有制、貧困和民主制度。它們都是道道地地的力量，因為它們是活動的而且又是積極的。它們之間的鬥爭是不可能休止的。

我這裡所指的不是狹義的貧困，雖然誰也不知道這種貧困還會深重到什麼地步。我指的是普遍意識到的不必要的剝奪——這是現代工業社會千百萬人民的通常狀況——，以及與這種狀況相伴隨的對社會事務現狀不滿和懊喪的深切感覺。說現在的情況比過去要好些，這並不能回答問題。人們生活在現在，不是生活在過去。不滿是在了解了可能達到的情況與實際情況有多麼顯著不同之後產生的。有一個普遍的而且可以證實是合理的看法：一般男女的命運毋需壞到現在這種地步。為了適應目前的需要，我只要作以上的說明就夠了。

人們必然要針對某種目標來發泄這種不滿，並且自然是針對

着财富、针对着占有财富从而对国家政策具有决定性影响的那些人来发泄的。第三，现在存在着使普通的男女具有一种新的权力的政治上的民主制度。

这些力量之间总是暗中存在着矛盾的，在异常困难的时期，如广泛而持久的失业时期，就爆发成为公开的斗争，并使当时的政府和政体受到很大的压力。有时，如在德国，这种压力使政体崩溃了。破坏德国魏玛宪法的不是凡尔赛条约，而是失业问题。德国人有工作做时，希特勒的话起不了任何作用。失去了工作也就失去了地位。当希特勒疯狂叫嚣德国在国际间的地位低落的时候，那就是听他讲话的每一个失业工人缺乏地位的戏剧性的表现。不需要相信“经济人”的主张，才能承认这一点。

事实上，在失业现象开始缓和的时候，德国人已经开始离弃希特勒。再过一个短时期，也许他就会失败。魏玛共和国遇到凡尔赛条约还能生存下去，它遇到凡尔赛条约加上六、七百万德国人的失业问题，就不能生存了。决定性的因素还是失业问题。(1)

因此，在资本主义的民主国家里，这个问题归结起来就是这样：或是贫困利用民主制度取得对财产权斗争的胜利，或是财产权害怕贫困而摧毁民主制度。当然，这个问题决不会以这样简单的说法出现的。这个斗争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是会打出不同的旗帜的。而且所发生的也可能不是灾难性的失业。也许有一场像战前英国有过的那种比较缓慢的磨擦。但是，在任何社会里，贫困、巨大的财富和民主制度，终究是互不相容的因素。

这就是对许多孤立地看待自由的人的答复。一个自由的民族总是不肯忍受可以避免的贫困的。如果要保全自由和扩大自由，就必须结束贫困，此外没有其他解决的办法。怎样防止这三种力量发生直接冲突，是那些政治意识比较强的保守党领导人的主要

課題。財富怎样才能說服貧困去運用它的政治上的自由來維持財富的權力？二十世紀保守黨政治的全部藝術就在於此。

只要政治是一些互相競爭着的觀念與理想之間的鬥爭，這些觀念與理想總是依附在這三種力量中某一種的周圍的。一般的情況是，鬥爭者們只知道那些驅使他們去鬥爭的觀念與理想，而這一事實就使他們能夠產生熱情，並且往往敢於做出使自我犧牲和利他主義提高到崇高地位的行動。但是，在他們周圍發生作用並通過他們起作用的一些控制力量的相互影響，造成一種推動力量，而他們的那些品質始終是被动員來為這種推動力量服務的。

如果認為這是对個人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的譏嘲的看法，那就是否認人們有可能對那些在社會上採取共同行動的個人的集團的行為進行系統的研究。當我們把過去的行為作這種概括說明時，那就被稱為社會科學。為什麼用同樣的方法來說明當前我們周圍發生的事情時，就要稱之為犬儒主義或機械宿命論呢？這是不是說，唯心論的實質就在於對我們行為的動機、我們所做的事情、我們採取行動的時間等等都一概置之不問呢？

我並不斷言，當社會改良者們受到感動要減輕窮人的苦難時，他們所考慮的是為維護財富統治所必須作出的最低限度的讓步。我所要堅持的是：當窮人沒有權力和地位來堅決要求減輕痛苦時，他們的苦難是沒有人過問的。

有一次經歷清楚地留在我的記憶中。當1926年礦工們正在鬧罷工時，很多人受到感動來听取他們的情況。教會中的某些顯要甚至自告奮勇要為礦主與礦工進行調解。他們確信煤礦主企圖強加於礦工的條件是不合理的，並且會使成千上萬的礦工家庭蒙受苦難和貧困。他們的努力沒有成功。礦工們失敗了，並且被迫在可恥的條件下復工。

这些可耻的条件延續了許多年。可是教会中那些显要受到感动出来干涉了沒有？根本沒有。在他們看来，問題已經解决了。他們从沒有把矿工的苦难当成是一个問題，他們认为成問題的倒是矿工們仍然能够进行斗争，因而能为社会上其他的人們造成一个問題。問題并不是矿工們的苦难，而是他們的斗争。不說出来的痛苦是不会引起反应的。二十世紀的許多社会改良是群众的民主力量的結果，而不是更加开明的表現。开明是随着政治自由的出現而发展起来的，也随着自由的衰退而减少。

政治上的民主制度把普通人的福利問題提到政治討論的日程上来，并且要求予以考虑。

法西斯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极权政府又把它从議事日程上勾掉。

资产特权階級的政治祭司长們^①对于私有财产、貧困和政治上的民主制度之間的不可調和的敌对是敏銳地察觉到了的。他們决不是一些认为自己有責任把社会推越貧困时代的政治家。他們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在每届选举中蒙蔽民主，使財富階級得以重新当选而执掌权力。他們变换腔調、制定計劃以适应这个目的。当人民的行动符合他們的意图时，他們就得意地說，“英国人民的精神是健全的。”当人們似乎拒絕听命于他們的时候，他們就开始看出“民主作为一个永久的政府制度的种种缺点”，并且警告我們說，“我們必須分清自由与放纵。”我們的行动符合他們的願望时，那便是自由；如果按照我們自己的意志去办，就成了放纵。

普选基础上的議會民主的作用，从它的历史发展上看，是暴露富有的特权階級，使人民加以抨击；它是对准財产权力心臟的一把

^①原文为 political high priests, high priests 本指犹太教的祭司长們，此处实指为资产階級鼓吹的政客，有諷刺的意味。——譯者

利劍。許多爭執交鋒的場所就是議會。

因此，議會的气氛，它的实际安排，它的程序，它的半宗教式的仪式，也就值得仔細研究。这一切对于只受过英国公立小学教育的那些来自大工业选区、携带着激烈意見的代表們，实在是很大的威胁。一个新社会秩序开拓者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顾任何清规戒律地猛冲猛撞。

“往事像阿尔卑斯山一样压在人們的心上。”下議院就是一整条山脉。如果新議員是一位上了年岁的人，他就已經拖着相当多的自己的往事，不免步履滯重，小心謹慎。进入議會以后，再添上六个世紀过去議員們隱約可見的阴影，他感到被压得倒了下去，而往往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他的最初印象是置身在一座教堂里。拱形的圓頂和彩色玻璃的窗戶，一排排的过去大政治家的塑像，有回声的大厅，輕手輕脚的服务人員和低声細語的交談，这一切和他剛經歷过的竞选活动中的那些拥挤的聚会和激烈意見的交鋒对照起来，是令人丧气的。作为人民的保卫者，他来到这里，希望在权力的中樞把自己的意見发表出来。实际却不然，看来期待他去做的是崇拜，而且是一切宗教中最保守的宗教——祖先的崇拜。

他首先应当牢牢記住的是，这些人并不是他的祖先。过去的积尘現在減低了他自己的足音，他的前輩們在这个过去里是沒有份儿的。过去，他的祖先們不是牧羊，便是耕地，或者就是侍候那些政治家們——他看見他們的姓名就写在他周圍的牆上，或者他們的挂在长廊上的画像正睨視着他。展現在他眼前的华丽宏偉的景象里的，并不是他那类人的过去历史。他們被隔絕在这一切之外；这些壁画所描繪的动人的場面，他們也是被禁止参加的。他是代表他的同类第一次参加議會的人。他要創造的历史，将不仅是

他現在所讀的史話中的一个插曲。它一定是迥然不同的，正如他現在所代表的社会地位同其他議員的社会地位有天淵之別一样。(2)

为了保持他的批評意見的鋒芒，他会发现他必須采取一种等于是玩世不恭的怀疑态度，因为議会的程序对于可以緩和他的階級激烈情緒的措施是絲毫不遺漏的。从某种意义上說，下議院是一切代表會議中最沒有代表性的一个。它是防止外界真正的意見冲突在院內获得适当反应的細密周到的陰謀。它是安置在特权階級与大众不滿情緒的压力之間的一个防震器。

当新議員体会到决不可在坦率的演說里表露出激烈的情感时，他在这方面就有了初次的經驗。他的第一次演說使他領略了这一点。他新从选民中来，内心充滿了民間的疾苦和自己的憤懣，自然要尽量慷慨激昂，以期激起听众对此有所了解。

因此，他的演說是很有力的，也帶有相当大的刺激性，这是他既盼望而又担心的事。在对方起来答复的时候，他期待听到一个同样强烈而不妥协的回答。然而对方完全沒有这样做，那人严格遵循着議会的傳統，祝賀这位新議員极为成功地作了首次演說，并且客气地表示希望下議院将来能常听到他的演說。在場的議員們用低声的贊語，表示对这一十分虛伪的情感的情贊許。这样，对方就不再理会他了，轉而按照預定的打算繼續发言。这位新議員稍坐了一会儿以后，就悄悄地溜了出去。他如釋重負地过了这一关，同时也有一种莫知所措的挫折之感在侵扰着他。他原以为扔出去的是块石头，誰知却变成了海綿。

一个工人在下議院第一次演說的这种典型經驗如果不是那里的整个气氛的特点，我也就不会多費笔墨来描述它了。議會演說的古典風格是輕描淡写。这种風格不适合于劳动人民的代表，因

为它冲淡和掩盖了社会上存在着的深刻对抗。

直到 1929 年的大选，英国议会才在全面成人选举权的基础上被选出来。自由主义的历史任务是使人民在议会里掌握主权，并且企图在做到这一步以后，把议会的活动限制到最低限度。自由主义革命发现权力集中在大地主手里，层层上升，以至国王。等到财产所有权分散以后，加以城市发展的出现，一个相应的政治权力的分散似乎就成为明显和自然的趋势了。这件事一旦完成，自由主义的历史目标就空虚了。

托馬斯·杰斐逊是十分明了这一点的。⁽³⁾选举权和随之而来的一切，是較小的私有财产者在政治上的明朝化。在自由主义的政治理想的声明中，它主張人民对制定国家政策有被諮詢的权利；但实际应用起来，却是分散的财产权起来反抗集中的财产权。英国选举权的发展史确切无疑地证实了这一点。自由党一旦在议会中站稳了脚，就不急于扩大选举权了。的确，从此以后，沒有得到选举权的人只不过是保守党与自由党选举竞争中爭辯的題目罢了。再加上男性标准的傳統的頑固性，这就說明为什么自由党政府要反对妇女选举权了。当时妇女本身显然不是人民。

需要把自由主义的意图和它的成就加以区别。它的意图是想使随着产业革命而涌现的各种新型财产赢得权力。它的成就是不問财产状况如何而为人民赢得了政治权力。我这样说，并不是企图贬低自由党执政时代最好的代言人的真誠的理想主义。他們曾經极为誠懇地从各方面力求全部实现他們的理想，但在完成了他們继承下来的历史任务之后，鼓舞他們的推动力也就衰退了。几十年过去之后，他們演說中所发表的那些最精采的結論才得实现。

英国的政治民主只有二十一年多的历史。这一点需要加以強調，因为許多人把议会的存在和民主的存在混为一談了。英国議

会有几百年的历史，民主却刚刚成年。1929年，我第一次当选进入议会时，我是英国第一届由全体二十一岁的男子和妇女选举出来的议会的成员之一。

关于现代民主没有能够成功地解决当代的问题，人们已经写得很多了，因此，不应忘记作为政治制度的民主制度还没有成熟这一事实。无休无止的宣传旨在使人民相信他们已经长期掌握了权力，并且相信现在的情况是他们没有正确地运用权力的结果，而事实上，人民几乎还没有开始运用它。人民的自信心就这样地被摧毁了，从而铺平了道路，把权力移交给所谓特殊人物的阶级，或者交给一位被假定具备了人民所缺少的那些品质的领袖。

对民主的自信心进行这种巧妙的攻击，已经做得很彻底。英国的社会主义试验，有许多缺点应当归咎于此。这本书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更正确地认清这整个的问题。我目前所要谈的是议员们来到威斯特敏斯特^①的影响，以及议会两院的气氛和具体组织。

议会作为社会变革的工具这个职能，没有受到研究政治理论的人们的足够注意。自由党的时代已随着普选的实现而结束了。在这一点上，自由党和保守党的理论结合了起来，这两党都给议会规定了一个消极的职能。大地主们的政治权力已被摧毁，国王的权力受到了限制，再加上城市资产阶级的兴起，于是议会的主要职能就是征收维持武装力量所必需的某些税收，再就是给国家“维持场面”。

威斯特敏斯特的一切都服从于这个观念。这个观念支配着议会两院现行的具体安排、下议院的程序以及对常任文官^②的态度。

① 英国议会所在地。本文提到这个地名的地方，都是指议会。——译者

② 指不随内阁变更的包括次长在内的行政人员。——译者